

又一个 30 年: 文学的膜拜时代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中国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现象考察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广西 柳州 545007)

[摘 要] 上世纪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是我国文学的膜拜时代。一方面是全民对于文学的膜拜,另一方面是许多受到膜拜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当时,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是政治化了。但是,那时的文学作品,却又超越了政治,带有比政治更为宽广的文化意义;那时的文学阅读,偏重了思想的吸收,但仍然具有欣赏的意味。文学的膜拜时代告诉我们:文学并不反对写阶级斗争,但要超越阶级斗争;文学并不与政治无关,但不能只与政治有关。从政治走向文化,这才是文学之道。而阅读和欣赏,既不能只在思想方面,但作品的思想也应该是阅读和欣赏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文学膜拜; 政治; 写作; 阅读; 超越; 思想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3-0077-03

这些年来,“新时期 30 年”理所当然地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然而,还有一个 30 年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采用了零敲碎打的方式,把它分解为文革前 17 年和文革 10 年,而把后面 3 年多的时间归入到新时期之内,对它们作各自的独立研究。殊不知,文革前 17 年和文革期间 10 年,虽然因“文革”而存有很大的不同,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就文学而言,文革后的 1977 年至 80 年代初,和前 27 年也有好些相同的地方。在这约 30 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文学,呈现出许多与新时期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面貌。比如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特殊的文学阅读、欣赏,以及特殊的文学写作、宣传,等等。这是一个文学的膜拜时代,其内容摘要为:对文学的膜拜,与受膜拜的文学。关键词只有一个:膜拜。

一 对文学的膜拜:虔诚、纯真的政治化的文学阅读和欣赏

在文学的起始时期,甚至可以说在已有文字作品在案的我国先秦时代,都是不存在对文学的膜拜现象的,因而也就没有受膜拜的文学。《诗经》中的“风”、“雅”都不是,“颂”也不是。古代的人,草民膜拜的是上天,贵族赞颂的是上天和先帝,而那时的文学,当然也不是受人膜拜的作品;盛唐时期也没有文学的膜拜现象,只是对文学的利用罢了:一般的诗人、作家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或者对于政治进行某种干预;而统治者则是利用文学来充当政治。其实,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都是利用文学,不是膜拜文学,他们膜拜的只是权力,不是别的。真正的膜拜是从鲁迅开始的,虽然他也

想利用文学,但利用之前首先是对文学的膜拜,或者说是因为膜拜才有利用。而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却不尽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文革时期,甚至到文革结束之后的 80 年代初,大众对于文学的膜拜到了空前的地步,把文学看成无比崇高、无比神圣的尤物。进入 80 年代再过了一些时间之后,这种膜拜现象才逐渐消失。而在文学膜拜时代已经挥之远去的今天,作为这一时代的亲身经历者,回味一下那段时光,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49 年新中国宣告成立,50 年代初我国南方对匪特的清剿完毕,中华民族终于达到空前的统一。这统一,不只是版图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全国人民的思想都统一在政治之上。由于政治上的胜利带来了政治上的狂欢,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的人民大众,从此过上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化的生活。社会也因之成了政治化的社会。政治化的社会造就了政治化的人文生态环境,而政治化的人文生态环境,又造就了人们政治化的阅读心理,从而又产生了政治化的阅读行为。

从那时开始,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文革期间,连人们的名字,甚至饭桌上的菜名,都是要“去封资修”的。人们都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当然也这样来看待和要求文学,即以无比虔诚,同时也是无比纯真的政治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对于一些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的文学作品,不但会加以排斥,而且还会立即进行批判。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20 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学的政治化要求,原本只是对革命阵营内部起指导和约束作

[收稿日期] 2010-02-20

[作者简介] 刘江(1948-),男,广东梅县人,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用,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绝对的管制性的威力。文学绝对的成了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或者说,成了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文学也就成了政治,或者说是另一种政治。文革之前关于某人“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就是绝好的证明。由此,政治化生活中的大众,便由于对政治的服从和尊重,延展到了对于文学的仰慕和膜拜。在那时,作家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在农村,一个有较大名气的作家的声望,绝不低于甚至高于一个县长。文学具有无比巨大的号召力。

文学的号召力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因而,文学的阅读成了一种政治行为,人们是怀着崇高的理想,希冀着到作品中学习英雄人物、吸取精神营养的愿望来阅读文学作品的,大众在阅读作品时,并不太在意作品的艺术成就,而看重作品的思想情感。人们谈的是向作品中的人物学习什么,或者鄙视作品中某一人物的什么,真正的把文学看成是人生的教科书,把阅读视作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重要活动。

即使是在欣赏,也是欣赏作品在描写人物、叙述故事时如何恰当地表现了怎么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品质。而评论界在评论作品时,也特别的强调作品的政治教育功能。当时,在社会上,在单位里,都有许多阅读团体,常常举行集体的读书活动。所以,从50年代开始至文革之前,文学的阅读是属于全民的。文革时期,虽然以往的许多作品都受到了批判,但是,八个样板戏,它们的舞台演出和剧本,以及某两个人的小说和诗歌,却受到比之以前更为虔诚的观看和欣赏。文革结束后,虽然否定了样板戏,但是在批判“四人帮”时,那些批判“四人帮”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性文学评奖中的获奖作品,基本上是批判“四人帮”的作品)却又受到空前的阅读和热捧。当然,这些都是主要从政治思想着眼的文学阅读。

二 受膜拜的文学:主体性并不完全的政治化的文学写作和宣传

那时的文学,和当今完全不同,创作者不是根据读者的需要和爱好来创作的,而是出于自己的创作欲望。而这种创作欲望,一方面来源于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另一方面,来源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两方面的结合,便产生出创作的念头。而其中,政治需要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需要,哪怕再有生活经历和体验,也是不会进入创作过程的。反过来,只要有这种需要,作家自然会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进入创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作品的立意、构思阶段,主体性不在于作家身上,而在于政治的需要上面。在进入创作过程之后,作家才有了主体性。然而也不尽然,因为在创作过程当中,甚至在作品完成之后,还要不断的根据政治需要来矫正作品的内容,包括人物和故事,甚至细节的描写。《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都是典型的事例。当然,这里也有特殊的例子,比如赵树理在写作《三里湾》时,他就没有根据政治的需要写出农村中富农的破坏活动,因为根据作家的生活经历,并没有这种现象。然而这是极为个别的事例,所以在许多评论文章中,在作家自己的创作谈

之中,这件事情才会特别被谈及。

还要说到作品出版之后的事。那时是没有广告的。但是,却有比当今广告威力强大得多的出版宣传和文学评论。这种宣传和评论,当然不是像现在一样,注重作品的可读性,而是强调作品的政治意义和教育价值。文学史上留存的那时的著名作品,都经历过这样的宣传。所以才能成为时代的红色经典。

而这一切,包括写作和宣传,都是源于政治化社会中对文学的膜拜。在那个时代,文学是太重要了!因为它太赋予政治的色彩了!

三 文学膜拜时代:阅读和写作对于政治的超越

当我们以现在的目光对准20世纪这约30年间的文学膜拜现象时,我们似乎都会感到可笑甚而可说是荒唐。这叫文学的阅读和欣赏么?这叫文学的创作么?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在阅读时主要不是想得到多少的文学享受(请注意这“主要”二字),而是想接受到政治的教育,一种绝不亚于政治报告的教育;而那些文学作品,因为重于表达官方的政治思想,缺少作为文学应有的对于生活的独特感悟,因而也就缺少了对于受众的启迪和警醒作用。所以,从本质上看,那时的文学阅读,是受众失去了某种主体性的带有约束性的阅读,谈不上完全意义的欣赏;而文学的创作,也失去了作者完全的主体性,是一种带有约束性的写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自由写作。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明显的显露出内容上的缺陷。这是不待言说的。

然而这大概或者只是尚未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们的感受。而对于那一时代的经历者来说,其感受却没有如此的简单。他们想起当年的阅读,常常还会激动不已,甚至还会把这种阅读和自己的成长联系起来。而且,他们当时的确感到莫大的满足。这是为什么?

首先应该说:完全否定那30年的文学阅读和写作,是不公平的。认真回味一下,我们便会感到,当时的阅读虽是政治化的阅读,但却又是超越了政治的阅读,绝对化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当时作品的人物,都是具有革命英雄品行的人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这是文学所给予的感染,而不是政治的威力。在文学的阅读中,英雄思想的感召力,高尚情操的感染力,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是不能否定的。

再说那些受到膜拜的作品,同样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是表现政治。当时,直至以后很久的时间,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都是依据列宁的说法。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可是那些作品,在描写阶级斗争时,有几点是不平常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一是,它们不是简单的给人物贴上阶级的标签,而是努力地写出人物精神面貌;二是,在写人物的精神面貌时,突破了政治品质的阶级界线,着重表现人类公认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三是,不是孤立地写出人物个人或者阶级的行动,而是充分地写出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政治人物并非只是阶级的人,同时也是人民群众之中的一分子。正因如此,所以,作品所写的人物的行动即阶级斗争,并非只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而是人类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正反两方,分别代表正义与邪恶。作品的人物,

既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但同时又是正义的渴求者和争取者、光明前途的奋斗者。英雄人物的理想并不只是某一阶级的理想,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比如公平,平等,正义,等等。作品的主旨,也不只是宣扬某一阶级的思想,还有高尚的人类精神,比如反抗压迫,改造旧的世界,坚贞不屈,等等。所以,这样的作品所表现的并不是纯粹的阶级的政治,而是具有比阶级的政治广阔得多的人类视野中的文化意义。从这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比如《红旗谱》、《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红日》等等,都是超越了政治的具有文化意义的作品。当然,这里又回答了一个问题:直到现在这个早已宣布不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这些作品之所以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之所以还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原因就在于它们并不局限于所描写的阶级斗争本身,而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意义。

这里又可以得出一条文学的创作规律:文学并不反对写阶级斗争,但要超越阶级斗争,而着眼于文化。文学并不与政治无关,但不能只与政治有关。只与政治有关就成了政治教科书。从政治走向文化,这才是文学之道。关键,不在于无关,而在于超越!

四 文学膜拜时代: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读者的进取心以及对作品思想的欣赏

西方的一位批评家琳达·哈钦说过:“历史性的思考便意味着批判性的和语境性的思考”^{[2][4]}而当笔者在对那约摸 30 年间的文学进行“批判性和语境性思考”的时候,思绪和感情都是极其复杂的。甚至于复杂到难于保证自己表达的准确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笔者对那时违反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的文学写作和阅读感到遗憾,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那时的文学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会更加完美;但是另一方面,笔者又认为那时许多的文学作品,无论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的提炼,语言的运用,都为当今的文学作品所不及;而那时的读者,其阅读的认真态度和欣赏的水平,也要大大超过当今。为此,笔者对于那一文学膜拜时代,不禁惊叹不已!

然而,紧接着笔者的脑海里便又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样的政治环境,那样的人文环境,能够产生好的作品,而当今这样宽松、这样自由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却不能产生传世之作?当然,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一部优秀作品,但是笔者认为,它们思想的贫弱,气质的平庸,都是显然的。无论如何,不能同《红旗谱》等作品相比。这是为什么?

想来想去,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学,是不能没有约束的。这约束,当然不是简单的政治约束力,而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广大受众的高尚的进取心。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学膜拜时代的政治影响力,扩展理解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事实上,当时的政治对于作家的要求,虽然不只表现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同样,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当时读者的政治阅读心理扩展理解为进取心。事实上,当时广大的文学阅读者,的确也是

怀着进取心而去阅读文学作品的。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作家,哪个不是把创作看成是崇高的革命工作?哪个作家不下农村,或下工厂,或下军营,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哪个作家不强调和工农兵同甘共命运?不用说和人民群众离心离德要受到批判,就连一些人表现出某种骄傲情绪,都要接受严厉的批评。当时对某一青年作家的处理是为人熟知的。这些,都是因为作家们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建设祖国,实现全国人们共同的崇高理想的重大使命,因而才赋予创作以莫大的光荣(这和现在的好些作家只是为了自己捞钱完全是两回事)。只有有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才会写出既是活生生的又是具有崇高理想和高尚人格的人物,同时也塑造出与之相映照的各色人物,以及为表现这些人物所需要的动人故事;而只有读者具有高尚的进取心,才会积极地阅读和欣赏这样的作品,我们的文学才会得到真正的繁荣和健康的发展。文学膜拜时代的文学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上世纪文学膜拜时代对于文学的阅读虽然重在政治思想方面。这是为当今的批评家们和一些读者所诟病的。然而,阅读能够完全排除政治思想吗?能够排除文学的教育功能吗?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就不能欣赏吗?其实,西方的大作家也是大文论家歌德,早就告诉过我们:“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就是美。”^[3]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文学艺术的欣赏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文学膜拜时代尽管偏重了思想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艺术,但是,思想的欣赏,不也是欣赏吗?和当今的只想借文学作品取乐消遣,其品位,不要高雅得多吗?所以,无论是对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要求,还是对于读者阅读时欣赏作品思想的重视,都是文学膜拜时代给予我们的思考,也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还有琳达·哈钦,这位西方批评家也说:“历史指涉的是当前的事——直白地说。”^{[2][43]},而面对着当前,笔者却要“直白地”问:

让这笔财富真正进入当今作家和读者的头脑,到底还要多久?

[参考文献]

- [1]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70
- [2] 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C]//王逢振.2003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22

(下转第 83 页)

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语言现象产生的认知机制, 为解释语言结构与人们认知事物方式的特点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34
[2] 马玉汴. 意象理论在汉语量词辨析中的认知作用 [J]. 郑州大学学报, 2005 (4): 152- 154
[3] 李 灿. 临时量词短语的隐喻认知分析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7 (1): 122- 124
[4] 宋建勇. 现代汉语物量词和名词搭配的认知解释 [J]. 现代语文, 2006 (12): 20- 22
[5] 周 芴. 名词与量词组合关系研究说略 [J]. 汉语学

习, 2006 (1): 49- 55
[6]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157- 175
[7] 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3
[8]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72
[9] 王文斌. 再论隐喻中的相似性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3): 125- 129
[10]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169

The Cognitive Metaphoric Research on Classifier- noun Anomalous Colloca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WU Zhong-bo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distinctive and novel language structure, Chinese Classifier- Noun Anomalous Collocation has special rhetoric functions as well as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linguistic structure reveals our metaphoric cognitive mechanism, its appealing rhetoric functions are the result of the mapping process from the cognitive domain of classifier to that of noun. The cogni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fier- Noun Anomalous Colloca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process of this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hen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d human cognition.

Key words Classifier- Noun Anomalous Collocation; cognitive metaphor; similarity; mapping

(上接第 79 页)

Another 30 Years Worship Times of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riting investigation for the early 50s to the early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LU Jiang

(Liuzhou Railway Vocational Technology School, Liuzhou 545007,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50s to the early 80s in the last century is the worship tim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all the people worship the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many worshiped literary works came out. At the time,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politicized. However,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at time were beyond the politics with mor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t that time, literature reading was emphasizing absorption of ideas, but still enjoying the flavor. The worship times of Literature is to tell us, it does not object to the class struggle, but beyond the class struggle, literature does no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but is not related only with politics. From the politics to the culture, this is the road of literature. Reading and enjoying can not be only ideological, but the works idea should also be the important content to read and appreciate.

Key words literature worship; politics; writing; reading; beyond; ideas